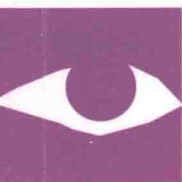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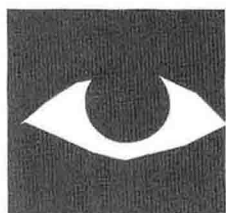
Xianshidai De Lixing Ziyou Yu Yiyi

现时代的理性、自由与意义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邹平林/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现时代的理性、自由与意义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Xianshidai De Lixing Ziyou Yu Yiyi

邹平林/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时代的理性、自由与意义:黑格尔、马克思以及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 邹平林著. —南昌:江
西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 - 7 - 210 - 06630 - 9

I. ①现… II. ①邹… III. ①黑格尔, G. W. F. (1770 ~ 1831)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马克思主义哲学 - 研究 ③哈贝马斯, J.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6.35 ②B0 - 0 ③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63151 号

现时代的理性、自由与意义——黑格尔、马克思以及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

邹平林 著

责任编辑:徐旻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 - 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 - 86898801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sh.com

E-mail:gjzx999@126.com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4.75

字数:400 千

ISBN 978 - 7 - 210 - 06630 - 9

赣版权登字—01—2014—34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58.00 元

承印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言

就现代性批判这个主题而言,没有什么其他的主题能够像这个主题那样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学科领域,以至可以说,现代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过往的辉煌已无法遮蔽它自始以来就存在的某种内在的缺陷和问题,这些内在缺陷和问题曾经在现代社会的凯歌行进中被人们所忽略,而如今,它们却在现代社会的成就中日益膨胀,渐而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迫使人们不能不对现代性本身以及它的整个历史进程进行反思。当然,现代性问题是—个大话题,涉及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内容艰深,主题庞杂、资料繁复,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均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现代性批判的切入点。然而,对现代性问题的总体思考却始终是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内容,而这样一种思考唯有哲学的理论思维才能承担起来。

我的学生邹平林博士奉献给读者的这部专著《现时代的理性、自由与意义——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从总体上反思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力作。它不是纠结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而是着眼于贯穿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普遍性和根本性问题。这表现出哲学关注现实的独特方式,即把现实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探索现实问题背后的深层根源与内在逻辑。就此而言,作者这一选题并非是书斋中的玄想,恰恰是对现实的深沉关切。

将“理性、自由与意义”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主题或主线,并且将黑格尔、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三位思想家作为现代性理论发生重大转向的标志性人物,表现出作者在庞杂主题中把握问题主线、在众多思想家中抓住理论典型的敏锐学术洞察能力。就思想层面而言,“理性”确实是划分“传统”与“现代”的一个标志性概念。在作者看来,“理性”在前现代社会中尽管也是支撑和规范生活的最终依据,但传统“理性”总体上是一种源自神意或世界固有条则的形而上学的实体理性。只是在现代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人”自身才作为

独立无限的“主体”取代了神的意志或世界固有法则而成为理性的根源,主体理性才取代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实体理性而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以及一切理论的批判和规范基础,人类也才由此而进入了所谓的“理性时代”。现代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所遭遇的一切问题、所面临的一切挑战与困惑,都可从某种意义上看作是主体理性谋划的结果,或至少与主体理性的能动谋划息息相关。因此,试图对这些成就、问题与挑战做出系统考察与评判的现代性理论,必然要溯源到理性以及人们对理性的理解这一更为总体和更为根本的层面上来,“理性”由此成为现代性理论的首要的和总领性的核心主题。

“自由”向来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但是,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不仅“自由”的形态与内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传统的实体性自由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而且“自由”在生活中的地位与权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由”在传统社会中固然是一项重要的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中却成为个体借以自我理解和自我安顿的根本性价值。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摆脱传统社会关系束缚的同时,又在现实中和观念上陷入了对物和资本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普遍强化,从而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相互强制和自我强制,亦即陷入了自由的悖论。因此,如何将现代人从普遍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合理、更全面地实现人的自由,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一大核心主题。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在直接给定的共同体生活中以及各种相应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中获得自我理解并从而安顿自身的意义。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我理解 and 意义安顿方式,而要求将其自我理解 and 意义安顿置于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由的悖论却又使得现代个体往往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使得其自我理解 and 意义安顿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如何克服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恰当地解决现代人的自我理解 and 意义安顿问题,也始终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主题。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就始终作为一个明确的、核心的思想主题在德

国理论界得到批判性的传承,而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则是这一思想传承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式人物,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三次转向。

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启蒙哲学,深刻地体现了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基本原则,但只是在黑格尔阐明了“现代”概念之后,“现代性”才成为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揭示了“现代”自身所包含着的矛盾与困境,开启了“现代性”辩证法。黑格尔对“现代性”辩证法的揭示,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一次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而所谓“现代性”则是指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生活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表面看来,“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以及“现代性问题”似乎是由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所导致的,即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本身得到说明,其片面性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片面性。因此,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必须进一步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将“现代性”从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学问题,这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二次转向。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理想”是人类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尝试方案,“现代性问题”则是人类在应对这种挑战时所出现的失误。“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从社会生活整体中分化出来并得到独立发展的经济子系统,遵循的是目的理性原则,它的过度膨胀使得目的理性原则侵入并主宰了生活世界,瓦解了生活世界中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价值理性原则,导致主体间的相互强制以及主体的自我强制,现代主体由此陷入了自由悖论并从而消解了其生活意义。因此,要克服“现代性问题”并批判地实现“现代性理想”,就必须从主体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重建并回归生活世界,从而消除主客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强制并在相互理解中安顿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三次转向。

作者正是以“理性、自由与意义”为主线,对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这三位德国或者说德语系哲学家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从

而力图展现现代性理论变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以期为进一步的现代性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应该说,作者的这一努力是成功的。尽管未能面面俱到,但却基本把握到了现代性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较为准确地概括了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这三位哲学家的现代性思想,对他们各种的理论贡献以及各种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与挑战做了较为中肯而有见地的评价。

在我的印象中,邹平林是一个非常勤勉、思想活跃的学生。看到自己的学生能够对这一艰深复杂的问题做出如此深入、系统的思考和阐述,我感到很是欣慰。当然,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开端,我相信他一定会在这一领域继续耕耘,取得更大成就,并期待着他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做出更为具体、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阎孟伟

2014年6月于天津南开园

前言

无论“现代性”主题如何庞杂,始终都与理性、自由、意义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在相关。

质言之,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对包括自身以及自身生活在内的所有事物的一种试图提升到普遍性高度的思维把握。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尽管人们也将“理性”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思维规定,但这思维能力以及思维所把握到的理性内容却被认为并非源自人自身,而是源自某种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因而前现代的“理性”是在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当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现代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人”才作为自身独立无限的“主体”取代了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而成为思维和理性的根源,主体理性才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源自人类主体之外的某种实体的“实体理性”而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以及一切理论的批判和规范基础,人类也才由此而进入了所谓“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时代”。一方面,主体理性的觉醒与发展将人们从各种神话的、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人们极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从而极大地促进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主体理性的片面发展也导致了抽象的主客对立思维,从而带来了诸多的“现代性”困惑与问题。主体理性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多困惑与问题,正是“现代性”理论所围绕的首要的核心主题。

“自由”向来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得以突显了出来。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解除传统社会关系对人们的束缚的同时,又使人们在现实中和观念上陷入了对物或资本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普遍强化,从而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相互强制和自我强制,亦即

陷入了自由的悖论。因此,如何将现代人从普遍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合理、更全面地实现人的自由,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一大核心主题。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在直接给定的共同体生活中以及各种相应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中获得自我理解并从而安顿自身的意义。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方式,而要求将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置于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由的悖论却又使得现代个体往往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使得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如何克服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恰当地解决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也始终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主题。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就始终作为一个明确的、核心的思想主题在德国理论界得到批判性的传承,而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则是这一思想传承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式人物。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三次转向。

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启蒙哲学深刻地体现了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基本原则,但只是在黑格尔阐明了“现代”概念之后,“现代性”才成为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揭示了“现代”自身所包含着的矛盾与困境,开启了“现代性”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理性是一种抽象的知性思维,它遵循的是主体思维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亦即主体性原则或主观自由原则。主观自由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现代性理想”正是从抽象的知性思维中推导出来的。由于其自身的抽象性,“现代性理想”不仅不能实现,而且在其试图按照自身原则实现出来的过程中,导致了诸如利益的分裂与冲突、伦理生活的瓦解以及主体自身的虚无与焦虑等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对“现代性”辩证法的揭示,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一次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而所谓“现代性”则是指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生活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表面看来,“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以及“现代性问题”似乎是由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所导致的,即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本身得到说明,其片面性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片面性。因此,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必

须进一步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将“现代性”从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学问题,这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二次转向。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理想”是人类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尝试方案,“现代性问题”则是人类在应对这种挑战时所出现的失误。根据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是由社会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相互关联着的领域或层面构成。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更新,社会劳动从社会生活整体中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子系统,相应地,相互作用领域也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生活世界。经济子系统遵循的是目的理性原则,而生活世界则遵循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价值理性原则。但是,经济子系统的过度膨胀使得目的理性原则侵入并主宰了生活世界,从而瓦解了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理性原则。目的理性原则体现的是以主体利益为目的的主客对立思维。主客对立思维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相互强制以及主体的自我强制,现代主体由此陷入了自由悖论并从而消解了其生活意义,因为意义的获得最终依赖于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生活世界资源,而不能从目的理性活动中直接产生。主体性思维或主客对立思维正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且,由于受主体性思维的框限,“现代性理想”本身也还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因此,要克服“现代性问题”并批判地实现“现代性理想”,就必须从主体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重建并回归生活世界,从而消除主客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强制并在相互理解中安顿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三次转向。

尽管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各自都发生了某种转向,但他们的理论之间又有内在的继承关系。

就“现代性”诊断而言,黑格尔将主体性原则看作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既有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历史合理性在于它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突显了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历史局限性则在于它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抽象地理解主体,从而一方面,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价值本身也是抽象的和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陷入抽象自我理解的现代主体以抽象的自我保存为最终目的,由此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导致了主体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虚无化。马克思尽管不同意黑格尔关于“现代性”

之产生根源的看法,但却肯定了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哈贝马斯则不仅同意这一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折中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之产生根源和扬弃方法的观点。黑格尔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主体性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现代性”的扬弃也就是主体性意识形态的扬弃。而马克思则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现代性”的扬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根源于主体性原则的过度膨胀,主体性原则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但主体性原则的扬弃并不必然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为前提。

就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而言,黑格尔一方面批判了“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并揭示和批判了由此导致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启蒙对理性、科学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乐观信念,从而始终坚持在发展中扬弃“现代性”这样一种理性辩证法立场。马克思的这种理性辩证法立场则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他更为全面、彻底地批判了“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比黑格尔更加乐观地相信真正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理想”必将得到完满的实现。哈贝马斯尽管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乐观,但同样坚持认为,人类能够在理性指引下克服“现代性问题”和实现“现代性理想”,从而始终致力于现代性理论的“重建”。

就社会进化或历史发展而言,黑格尔坚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可循的客观发展过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显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性以及这种发展的客观性。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调和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哈贝马斯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将文化价值理想和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承与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逻辑。他认为,社会的进化并非单纯地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也并非单纯地由思想文化层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同时取决于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能相互归并的方面。

就各自理论的价值底蕴而言,他们始终坚持人的自由解放、坚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和解。在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中,个体的利益、自由和平等

权利始终是不能抹杀的,并且始终与普遍的利益、自由和平等权利相互和解、相互促进。马克思在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状态时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无疑是对黑格尔关于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和解、相互促进思想的继承。而哈贝马斯关于“自由交往”的思想,同样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普遍和解、相互促进的价值诉求。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无疑都面临着各自的理论困境,但这并不影响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它是否直接地、具体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的问题,而在于它揭示和批判了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回应了人们的困惑,澄明了某种可能性,开启了某种人们可以向往的意义世界,甚至也在于它标明了某种“不可能性”。对于后来者而言,他们是路标。而沿着路标继续前行,则既是后来者的幸运,也是后来者的责任。

|目 录|

前 言	—	1
导 论	—	1
第一章 启蒙与现代性	—	26
第一节 启蒙理性的发展	—	26
第二节 宗教和形而上学权威的衰落	—	32
第三节 现代性及其核心主题	—	35
第二章 黑格尔对现代性的诊断、批判与扬弃	—	44
第一节 黑格尔之前德国的启蒙与反启蒙思潮	—	45
第二节 黑格尔对启蒙及现代性的诊断和批判	—	56
第三节 黑格尔对现代性问题的扬弃	—	72
第三章 马克思:社会革命与现代性的扬弃	—	96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颠覆	—	97
一、对黑格尔的批判与继承	—	98
二、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物主义辩证法	—	101
三、实践对理论优先地位的确立	—	103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现代性	—	106

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 106
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113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	— 126
一、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 126
二、作为社会理想与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	— 131
第四节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解以及自由与意义的实现	— 141
一、理性与生活辩证法	— 142
二、自由自觉的活动与俗世的幸福	— 148
 第四章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与现代性重建	— 163
第一节 主体性批判	— 165
一、对理性立场的现代性理论的批判	— 165
二、对非理性立场的现代性理论的批判	— 177
第二节 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189
一、劳动与相互作用	— 189
二、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	— 202
第三节 交往理论的现代性方案	— 229
一、对启蒙理想的批判与修正	— 230
二、以交往理性重建现代性	— 239
第四节 交往理性视阈中的自由与意义	— 264
一、生活世界	— 265
二、相互理解	— 270
 第五章 三种理论的分析、比较与评价	— 274
第一节 共同的批判所向:主体性	— 274
一、黑格尔:走向绝对主体	— 275
二、马克思:走向现实的个人	— 278

三、哈贝马斯:走向主体间性	— 281
第二节 共同的理论旨归:现代性的扬弃	— 285
一、对理性的坚持	— 285
二、对自由的坚持	— 305
三、对意义的寻求	— 316
第三节 各自面临的困境	— 322
一、黑格尔:绝对主义的形而上学何以可能	— 322
二、马克思:未来的理想社会何以可能	— 331
三、哈贝马斯:道德乌托邦何以可能	— 337
第四节 虚拟的对话:辩护与反驳	— 344
一、黑格尔的辩护与反驳	— 345
二、马克思的辩护与反驳	— 349
三、哈贝马斯的辩护与反驳	— 356
结 语	— 360
参考文献	— 364
致 谢	— 376
后 记	— 380

导 论

一、现代性与现代化

在英语中,“modernity”一词是与“modern”(现代的)、“modernization”(现代化)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用语。一般说来,“-ty”作为名词后缀,通常是指“性质”或“状态”,因而“modernity”译作“现代性”还是比较确切的,亦即指现时代的基本特性。但这样一种笼统的说法并未清晰地表达出“现代性”概念所具有的独特意蕴。只有揭示出“现时代”的各个方面的基本规定性,“现代性”概念的具体内涵才能得到把握,围绕这一概念的各种争论以及这一概念自身的历史嬗变才能得到清晰的理解。

“modernity”一词在西方学者的用法中有三种意义,分别是作为时期(period)、特性(quality)和经验(experience)。^① 这三种意义确实涵盖了“现代性”的多个方面的规定性。但是,关于“现代性”之动力或根源的思考似乎不能直接等同于关于“现代”之特性的思考,“特性”更多的是一种描述性概念,而“动力”或“根源”则更多的是反思性概念。另外,“现代性”很多时候又可以与“现代化”概念替换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一方面是指一系列用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的描述性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强调一种“现代特性”不断自我强化

^①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8页译注。

的客观动态过程,或者一种主动地以这些“现代特性”为目标的社会进程,前者指西方的发达国家,后者指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

当“modernity”用来指称一个时期时,较为妥当的译词应该是“现代”。“现代”是一个西方语境中编年史概念,指的是紧随中世纪而来的时代或时期。但“现代”又绝非仅仅是一个编年史概念,因为它被看作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时代”。这一“新的时代”开端于1500年前后。^①黑格尔将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这三件1500年前后所发生的事件看作是“新时代”开端的标志,因为这三件大事开拓了一个新的“世界史”视野。

马克思是最早明确地、直接地将“现代”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制度安排关联在一起的思想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时代,“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产阶级时代的不停动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②马克思的这段话既是对“现代特性”的描述,又是对“现代性”动力或根源的反思,并且改变了一种仅仅从文化精神和心性气质的迁变这一单一视角来探讨“现代性”的理论哲学传统。

就“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哈贝马斯指出:“‘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使用。”现代化概念涉及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核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认同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

^① 关于“现代”的开端,向来存在诸多争论。但所谓开端总是相对而言的,不能想象存在一道分水岭,将“前现代”与“现代”截然分开。20世纪的史学家往往将“现代”的源头追溯到13世纪,尽管“现代”的气息在13世纪有所萌动,但出现向“现代”转化的种种因素以及较为急剧的变化,是在16世纪开始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35页。